

游移與曖昧－王韜《漫遊隨錄》 的策略書寫與觀看之道

陳室如*

摘 要

王韜為中國近代化運動改革先驅，他於流亡香港期間展開了一趟破天荒的歐陸之旅（1867-1870），也成為晚清跨出國門的旅者先驅。這趟歐洲之行，是中國文化知識菁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對歐洲的實地考察，也為西方世界傳遞了更真實的中國形象。

王韜的旅歐遊記《漫遊隨錄》卻於遊歐後約二十年（1887 年）方於上海《申報》館發行的《點石齋畫報》上連載刊出。這部個人回憶錄的遊記出版形式反映當時上海社會的特殊文化生態，書中重組的記憶內容，也成為王韜推銷改革理念的策略運用。

特殊的時代背景與人生際遇，使得王韜的觀看之道始終無法擺脫既定框架，於中心與邊緣間擺盪不休；在觀看／被觀看的權力交換遊戲間，王韜也從他者眼中性別錯置的誤讀形象重新反思自我、認識自我。

關鍵詞：王韜、遊記、書寫策略、《漫遊隨錄》、觀看之道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講師。

壹、前言－先行者的回憶錄

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

1

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身分，王韜（1828-1897）²卻正因為曲折複雜的流亡歷程，展開了一趟自由的歐陸之旅，也使他在對位的體驗過程中，順利度過了原本可能難以接受、跨越的現代性裂變。

在十九世紀中國的眾多知識分子中，王韜可說是頗具影響力之前瞻性人物。羅香林便指出王韜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地位：

無王氏於同光之際，致力於中西文化之交流與變法自強之論議，斯未必即有光緒中葉以還，康梁諸氏變法維新之運動也。無晚清以還國父孫中山之鼓吹民權與建立民國，亦未必即有四十年來中國之所謂民主與科學之新文化運動也。³

比起九十年代後期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而言，王韜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開啓了之後一連串的改革運動。

習慣了扮演開啓者的先導角色，王韜也以前所未見的私人旅行方式走向世界，為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旅人開啓嶄新扉頁。1867 年他受香港英華書院的院長

¹ 美·艾得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作、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頁 9。

² 王韜長年羈留上海、香港，與西洋傳教士相友善，足跡更遠涉英、法、日本等，雖絕緣於仕途，卻針對中國與世界局勢檢討時弊，提出種種富強改革的具體方案，生平經歷大致如下：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原名利賓，改名瀚，後改名韜，字仲弢，一字紫詮，晚號弢園老人。王韜出身於塾師家庭，18 歲考上秀才，科舉失利後，為負擔家計，21 歲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ter H. Medhurst）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任編輯，歷十三年，撰有《西學圖說》、《泰西著述考》等書。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官員，獻攻打上海之策，事發後被清政府通緝，1862 年避居香港，協助英國人理雅各（James Legge）將《尚書》、《春秋左氏傳》等古籍譯成英文。1873 年與黃平甫在香港集資創立中華印務總局，出版《普法戰紀》等書。1874 年創辦《迴園日報》，任主筆，撰寫政論，宣傳變法自強，為中國早期的政論家。1879 年曾至日本訪問，1884 年獲李鴻章章許，始得返回上海，並為《申報》撰寫論說。1885 年任上海格致書院山長，1897 年 5 月病逝於上海，年 69 歲。

³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頁 86。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917）之邀，從香港出發前往蘇格蘭，直到 1870 年下旬，才結束旅程返回香港，此段期間，王韜居住於理雅各愛丁堡家中協助翻譯中國經典，並遊覽英國著名景點。

不論從出洋的時間先後、旅行時間長短或從事的工作屬性來看，王韜的這趟歐陸之旅，確可譽為「破天荒」之舉，⁴也難怪他會自傲於自己是「先路之導」的創始者角色：

余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先路之導，捷足之登，無論學士大夫無有至者，即文人勝流亦復絕跡。⁵《漫遊隨錄圖記·自序》

從中國走向世界這一角度來說，王韜的歐洲之行是中國文化知識菁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對歐洲的實地考察；從世界瞭解中國這一角度來說，王韜的歐洲之行更是一項歷史壯舉，以一個中國文化的活載體，向西方社會傳遞了更為真實的中國信息。

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來看，鴉片戰爭後、甲午之戰以前，王韜以一介布衣文士的身份在英國停留長達二十八月佐譯五經，能夠走出國門，接觸、研究西方文物制度，以當時來說誠屬難得。是時中國仍處於大動亂之中，而英國卻已是西方文明中心，英國的科技、社會制度，亦使其深受震撼。

王韜的歐遊記行《漫遊隨錄》早經公認為近代文化史中的重量型著作，它與歷任大清欽差錄出使日記或官方檔案普遍存在的制式生硬之病大相逕庭，其旅行方式不但更為貼近異地生活，也跳脫外在的器物表象而引發了更為內在的民情、制度層面等相關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漫遊隨錄》刊行的時間，是在作者遊歐後約二十年（1887 年），方於上海《申報》館發行的通俗刊物《點石齋畫報》上按月以一文一圖的篇幅刊出，嚴格說來，《漫遊隨錄》幾乎是一部作家晚年追想廿年前西土壯遊的回憶錄。⁶

王韜於中國近代化運動的貢獻與主張，歷來已多有研究。《漫遊隨錄》一書除了是王韜遊泰西的實錄記述之外，亦是其生平思想的重要材料，藉由此書，也可肯定這趟泰西之旅在王韜的生命史上確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意義。⁷

⁴ 當時比王韜更早踏上歐陸的僅有斌椿父子一行人，斌椿父子的歐陸之行雖早於王韜一年，但身份為總理衙門官派，且在英國官方色彩濃厚的赫德（Sir Robert Hart）督率之下，限制頗多，又由於遊歷國家太多，且前後只有五個多月的時間，斌椿一行對所經之國也只能作走馬觀花式的浮泛瞭解。

⁵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2。

⁶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 卷、9 期（2006 年 2 月），頁 9。

⁷ 王韜遊歐之前，對西學的態度是排拒的，即使礙於現實接受部分西學，也是迫不得已的。早年王韜世界觀亦較為狹隘，認為自己迫於生活，備書上海一事耿耿於懷，「逐臭海濱，為西人傭

然而，本文並不打算針對這些定論再加論述。王韜在歐遊後二十載才開始刊行《漫遊隨錄》的做法令人納悶，與當時不易取得的官方外交檔案相較之下，《漫遊隨錄》的內容為國人呈現了更為真實的域外圖像。相隔二十年後才出版的回憶記行，反映出何種書寫策略與市場需求？在流亡的行旅生活中，他又是如何從看／被看的過程中，產生複雜多變的對位覺知？除了新鮮獵奇的泰西資訊外，與王韜的傳奇生涯對照之下，這些問題都是《漫遊隨錄》所衍生出的多重閱讀意涵。

本文即欲以此為關注焦點，除了探討王韜於《漫遊隨錄》中所運用的書寫策略與出版概況，再針對書中所展現的視角轉換與引伸思考作進一步探究，試圖以不同角度切入，以期對《漫遊隨錄》一書有更深入的解讀方式。

貳、書寫策略－記憶重組後的再現與推銷

王韜在《漫遊隨錄·自序》中曾明言此書的出版動機：

蓋古人編詩，往往一官一集，於宦遊轍跡之所經，輒低迴俯仰而弗敢忘，誠以佳景當前而易忽，事後回思，如追亡逋，非有詩詞以記之，圖詠以傳之，直付之飄風塵跡、夢幻泡影而已，不大可惜哉。此余《漫遊隨錄》之所作由也。⁸《漫遊隨錄圖記·自序》

朋儔過從，與談海外遊蹤，輒為神往，咸曰：「何不詮次前後情事匯為一編，以佐談屑、擴異觀，俾作宗少文之臥遊，不亦可乎？」適有精於繪事者許為染翰，遂以付之，都為圖八十幅，記附其後，而名之曰《漫遊隨錄》，非敢與三君子抗衡也，亦非敢藉以問世也，不過聊以自娛而已。⁹《漫遊隨錄圖記·自序》

從序中所述看來，寫作遊記的原因僅是為單純自娛，為當初的旅行留下一些文字記錄。

書，計非得已，然捨此無可適者」。當時國人對外國人多鄙之為夷，使王韜迭有「徒跼天騰地於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的羞慚。常感「垂翅之鵬，不能奮飛，伏櫪之馬，已無遠志」。參見清·王韜，〈再寄孫惕菴〉，《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卷2，頁22、清·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咸豐八年10月4日，頁34。清·王韜，〈上江翼雲師〉，《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卷2，頁8。海外遊歷使他對西方文明經歷了從鄙夷到讚賞，進而主張師法的思想歷程，從而使他成為中國近史上站在時代前列的人物，對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社會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⁸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

⁹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3。

然而，如果對照王韜的生命歷程與當時《漫遊隨錄》的出版背景來看，可以發現，該書的出版，除了個人的創作動機之外，其實是在市場需求與個人聲望的雙重加溫效果之下，進而問世的策略性文化商品。

長年流亡在外的王韜，1884年得到李鴻章的默許回到上海後，已陸續於當時的流行刊物《點石齋畫報》上連載仿聊齋體的小說作品《淞隱漫錄》，並受到一定的歡迎程度。¹⁰

自1884年王韜返滬以來，不論是其隨感作品、推崇文友著作、各界文人讚頌王韜著作的詩歌……等皆佔據《申報》不少篇幅，¹¹而王韜亦與當時報界人士來往密切，活躍於上海文壇。

刊載《漫遊隨錄》的《點石齋畫報》則是以不同於傳統純文字的圖像形式，於光緒十年四月（1884年）創刊於上海，尊聞閣主人已於序中說明其創刊動機：

爰倩精於繪事者，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月出三次，次凡八幀，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¹²

每月上中下旬各出報一次，隨《申報》一同派送，亦單獨售賣，其創報宗旨，主要以繪圖傳播時事新聞，藉由圖像其所達成知識普及、新知推廣等目的，數量上至少保持在萬份至二萬份之間，銷售網遍及全國。¹³中國知識分子以至下層人士，獲得海內外時事要聞，創新發明，海外風俗民情，除同時代《申報》、《萬國公報》外，《點石齋畫報》當為第三個重要來源。¹⁴

《漫遊隨錄》所欲書寫的泰西記行即與《點石齋畫報》所蒐羅的「新奇可喜之事」類型相似；就出版商的利益考量而言，《淞隱漫錄》極受歡迎，假使能繼續推出暢銷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必可招攬一定人氣，且王韜本身的文壇盛名與傳奇性經歷更為作品宣傳的一大利器。就王韜本身而言，也可利用大眾媒體與通俗讀物出版作品獲得稿酬，對出版商與作者本身而言，可說是相得益彰。

¹⁰ 點石齋書局之後將出版過的《淞隱漫錄圖說》十二卷推出新版，之後還有寶文閣書莊出版石印本，將之易名為《後聊齋誌異圖說初集》再次發售，可見其於連載結束後仍受到讀者歡迎。參見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卷，9期（2006年2月），頁23。

¹¹ 同上註，頁22。

¹² 《點石齋畫報》，初集，甲冊版記及尊聞閣主人序。轉引自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傳播之圖說形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230-231。

¹³ 魯迅在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也提到《點石齋畫報》的巨大影響力：「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時務』—這名稱在那時就如現代之所謂『新學』—的人們的耳目。前幾年又翻印了，叫作吳友如墨寶。」參見魯迅，《魯迅全集》；《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278-279。由再翻印的事實看來，《點石齋畫報》不但於當時受到歡迎，即便到了民國時代尚有一定的讀者市場。

¹⁴ 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傳播之圖說形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278-279。

自 1887 年 10 月起直至 1889 年 2 月，王韜的《漫遊隨錄》便一直連載於《點石齋畫報》，第 127 期刊登到 177 期結束，共刊載五十篇圖文。¹⁵就現實考量而言，這一系列的行旅回憶除了揭示圖像形式已成為當時上海的另一種閱讀形式外，也說明了作家與出版商共同合作的市場機制下，文化產物所實際運轉的催生過程。

以圖像補充說明時事，的確更能滿足讀者對於域外生活的想像，然而，儘管《點石齋畫報》一開始便強調「畫報」之作用在於「蓋取各館新聞事蹟之穎異者或新出一器，或乍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說以徵閱者之信。而中國則未之前聞。」¹⁶，然而，雖強調以「徵實」為主要目標，但畫家多半仍憑想像構圖，未曾具有真正的遊覽經歷，因此，圖像補充固有其傳神生動的優點所在，但卻也有悖離事實、極為荒謬之處。例如圖一「博物大院」插圖，王韜描寫其於倫敦博物院所見之犀牛與鯨魚：「有犀牛一，大異尋常，云是開闢初生之物。有一鯨魚，其巨幾蔽屋數十椽，長約二百餘尺」，¹⁷《點石齋畫報》插圖所呈現的景觀，卻是一頭與犀牛樣貌相去甚遠的牛以及一尾佈滿鱗片的大魚，兩者皆擺設在半開放式的圍籬空間內。

以現今標準看來，當然令人覺得荒謬可笑，然而，這樣的圖像卻是配合著王韜的遊記書寫同時呈現於報上，文字與圖像的搭配固然能開發更為寬廣的閱讀群眾，不過，畫家與文字創作者的隔閡落差，卻也是另一個出版問題所在。十九世紀末期的大多數讀者或許尚無足夠見解能判別圖像謬誤之處，但這種商業策略運作下所導致的知識誤植，卻也呈現了當時上海文化市場閱讀生態所隱藏的問題層面。

其次，在文體方面，由於發表場地以報紙為主，我們也可以發現，王韜在遊記散文的書寫亦作了新的嘗試。他多半直接描繪奇異動人的西方風情，且於描繪過程中穿插大量的政治性議論，如對英法兩國的政治、法律、工業、軍事、文化等觀感，直接的個人政論表達，已突破中國古代傳統遊記散文寓情於景、寓理於

¹⁵ 王韜曾於〈自序〉稱「適有精於繪事者許為染翰，遂以付之，都為圖八十幅，記附其後，而名之曰《漫遊隨錄》」。據此，如果一圖一文，當有八十篇，然八十篇本的《漫遊隨錄》未見印出。今存此書的最早印本，即申報館附屬點石齋書局石印的《漫遊隨錄圖記》，共三卷五十篇，截至光緒十五年，未見有《漫遊隨錄圖記》開印或發售的消息。至光緒十七年（1891 年）上海著易堂刊印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收入《漫遊隨錄》，不分卷，無〈自序〉，每篇均無題，並頗多刪節，也缺末一篇〈屢開盛宴〉，況且文字悉據點石齋本。由此可見，點石齋本《漫遊隨錄圖記》當印於光緒十六年（1890 年），《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即據點石齋本節錄排印。參見王稼句〈前記〉，收錄於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7。

¹⁶ 《點石齋畫報》，初集，甲冊版記及尊聞閣主人序。轉引自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傳播之圖說形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30-231。

¹⁷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87。據鍾叔河校正，「長二百餘尺」應為「二百餘丈」之誤。

遊之傳統模式，反而更近似於一種論辯文體，表面上看來處處寫異國奇觀，實際上卻藉此反省中國的現實與現代性未來，突破遊記散文的傳統侷限。¹⁸

Lauren F.Pfiser 便以作品本身為關注焦點，認為王韜的旅行回憶書寫，其實擁有更直接的推銷目的：

我們可以對王韜的《漫遊隨錄》有另一種更為批判性的閱讀方式，把它視為一個改革派意識型態者透過重組過往的旅程，來向大眾「推銷」某些觀念。找出王韜在 1880 年代中撰寫這份似乎是「個人」旅遊記錄的目的，是一件很有啟發性的工作。¹⁹

至於王韜究竟在書中推銷了何種觀念？Lauren F.Pfiser 在文中沒有進一步論述，只藉由柯文（Paul A. Cohen）所發現的一個有關年期上錯誤，提醒讀者應以略微批判的角度來看待這份第一身的傳記。²⁰

從〈自序〉上來看，王韜的書寫動機並沒有太過特別之處，然而，事隔二十年後的回憶重組，與旅程剛結束時的心境反應自然大不相同，王韜雖未明言，但倘若結合時事發展與王韜的生命歷程來看，可以發現，《漫遊隨錄》的書寫，並非只是單純的回憶感發與行旅記述，王韜是藉由記憶的耙梳過程進一步印證自己的個人理念。

以王韜對火車的描寫為例，第一次實際搭乘火車，迅速的便捷性讓王韜極為震撼：

自海口馬賽里至法京巴黎斯，計程一千八百餘里，為時不過七八，輪車之迅捷真如颺飛電邁矣。²¹《漫遊隨錄圖記卷一·道經法境》

¹⁸ 中國的遊記散文往往是作者遊覽山水亭台的記錄，要求直接刻畫作者對於山川風光的體驗，寓情於景、寓理於遊，特別講究將哲理性議論隱藏於豐富而生動的景物描繪之中。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系列辨識其突出代表。王韜大膽突破此種遊記形式，嘗試直接以議論入遊記，賦予其新的文體活力，這種寫作方式，也影響了後來如梁啟超的遊記作品如《夏威夷遊記》、《新大陸遊記》等。參見王一川，〈王韜—中國最早的現代性問題思想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第3期（1999年3月），頁62。

¹⁹ Lauren F.Pfiser 著、尹凱榮譯，〈王韜與理雅各對新儒家憂患意識的回應〉，收錄於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頁129。

²⁰ 柯文指出，理雅各及王韜是在回香港途中於巴黎拜訪了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9-1873），這是王韜自己在其他地方談及有關是次事件的記載中可以清楚看到的；但王韜在《漫遊隨錄》的敘述中把這次事件視作到達英國前之旅途的一部份，故此並不是與理雅各一起。參見（美）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8。張海林也注意到了這個錯誤：「王韜《漫遊隨錄》卷二，頁87說他與儒蓮見面於他赴英途中，但據王韜《弢園尺牘》卷7〈與法國儒蓮學士〉、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11〈法國儒蓮傳〉等考證，兩人見面時間應是1870年，王韜返程之時。」參見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21。

²¹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58。

之後在英國倫敦結識了一位賣酒女子的父親，此人乃「司理輪車鐵路者」，藉由談話過程，王韜對英國鐵路的發展歷史也有更詳細的認識：

英國初創輪車，國人莫不騰謗，蜂起阻撓，謂舉國牧御由此廢業，妨民孔多豈知輪車既興，貿易更盛，商旅絡繹於途，輪車不及之處，濟以馬車，輪車獲利尤在載貨，貨多則生理大、利息倍，稅課亦增，實為裕國富民之道。國中苟有變亂，聞報調兵，朝發而夕至，有如疾風之掃葉，兵行速而軍需省，無過輪車者。苟無輪車，征夫騎行，時虞盜劫。自建鐵路後，人行萬里，無意外之警，即有急務，頃刻可達。²²《漫遊隨錄圖記卷一·製造精奇》

對照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王韜雖是在太平天國之亂平定（1864 年）後的第一年來歐洲，但中國境內仍有流竄山東、河南、江蘇與湖北的捻亂，以及肆虐西北、西南的回亂，這些民亂直至 1873 年才獲得控制，²³

呂文翠便認為王韜在文中提到有關英國政府靠輪車評定民亂的部分，「有提供清廷政府借鑑來政治表態，撇清自己與民亂的嫌疑，洗刷當年畫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而遭通緝的罪名」；也與當時李鴻章推動鐵路修築的現代化政策相互呼應，具有「間接誘導庶民大眾接受先進國家業已普及的新興交通工具，與世界思維接軌的意義」。²⁴

Lauren F.Pfiser 與呂文翠所提到的觀點可說不謀而合，統整兩人的論點，王韜正是以臨場感受的親身體驗，在作品中重現對西方科技的推崇，並結合時事，推動現代化改革理念。

同樣的觀念推銷也可在《漫遊隨錄》其他部分中找到。例如他回憶當時參觀愛丁堡書院的過程，對於英國教育制度有更為深刻的體認：

（書院）所考非止一材一藝已也，曆算、兵法、天文、地理、書畫、音樂，又有專習各國語言文字者，如此庶非囿於一隅者可比。故英國學問之士，俱有實際其所習武備文藝均可實際見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²⁵《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博物院》

²²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06-107。

²³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05-12。

²⁴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 卷，9 期（2006 年 2 月），頁 35-36。

²⁵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頁 117。

注意到英國注重科學文化的教育體制，這也與他在結束歐陸之遊、回國之後大力提倡格致之學的教育理念相互呼應。

早在寫作《漫遊隨錄》之前，王韜便已提出教育改革思想，主張廢八股、改科舉、廣泛設立新式學校，改以實學，他主張的實學內容則為：

至於所考試者，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詞章之學，曰輿圖，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辯論時事，曰直言極諫。凡區十科，不論何途以進，皆得取之為士，試之以官。²⁶

主張以實學取士的構想，雖仍包含傳統經史的教育模式，但強調格致之新式科學教育已有基本理念萌發。

以 Lauren F. Pfiser 所提出的「觀念推銷」論點來看，結束歐洲之行的王韜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刺激之後，進而調整自我認知，提倡不同以往的教育理念。²⁷之後在寫作遊記的回憶過程中，再現當年體驗情境，並予以肯定其制度層面。這種書寫策略，的確是一種個人理念的推銷手法，在介紹新事物的過程中，參與了個人主觀的價值判斷，也與王韜的改革理念有所結合，相互交融。

正因為《漫遊隨錄》的特殊出版方式，使得這部遊記的書寫，在回憶旅行的過程中，也添加了多種更為複雜的其他因素。在當時上海的文化消費市場中，圖像與文字的結合、作者與出版商的經濟考量，營造出一部具有獨特個人意識與風格的旅行書，發表場地與作者魅力的相互運作，造就更為熱門的消費市場與暢銷盛況，《漫遊隨錄》的書寫與出版無疑是一種策略性的文化商業遊戲。

而經過一定程度的人生歷練後，從域外生活回到域內，再於域內審視過往的域外生活時，疆界消融，孰先孰後的分別已不再清晰明顯。早年提倡的改革理念以不同形式出現，化為重現旅行的文字。

以這兩個觀點來看王韜的《漫遊隨錄》，的確可以將這部遊記的書寫與出版，視為一種策略性的運用，旅行記憶重組之後，向讀者推銷新鮮獵奇的域外生活、也順勢推銷提倡已久的諸多改革理念。

²⁶ 清·王韜，〈變法自強中〉，《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頁31。從1874年到1884年10年間，王韜在《循環日報》上以每日一篇社論的頻度，大量發表政論文章，系統宣揚變法思想，聲名因而大著。〈變法自強中〉便於此段期間發表，早於《漫遊隨錄》所發表的1887年。

²⁷ 在歐陸之旅前，王韜對於西方科技仍是抱持著相當排斥的態度，認為沈迷西方精巧事物是玩物喪志之事：「鐘表測時固精於銅壺沙漏諸法，然一器之精者，幾費至百餘金，貧者力不能購，玩物喪志，安事此為。其他奇技淫巧，概為無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韜謂此數者，即中國不行，亦不足為病。」參見清·王韜，〈與周弢甫徵君〉，《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卷4，頁5。

參、觀看之道—從邊緣到中心的游移擺盪

在探討《漫遊隨錄》一書所呈現的觀看之道前，我們必須對王韜的特殊境遇有進一步探討，方能更清楚瞭解為何在旅行回憶的書寫中，作者會呈現出游移的視角轉換。

生於江南、長在上海、中年時飽受西式教育、中年後避地香港英國。自三十四歲至六十二歲，人生最精華的而立至耳順的年華皆在域外度過。正因為這種特殊的人生際遇，使得王韜得以用更開闊的眼光來觀看當時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也提出許多更為先進的改革理念。

早年科舉失利的結果，其實已暗喻了王韜與權力核心的遠離，在上海接觸了西方文明後，處於傳統價值與新觀念的衝擊之下，更讓他開始成為游離於中西兩大文明之間的「中間人」，²⁸之後被迫選擇的海外逃亡生活，並沒有讓他找到適當的寄託，個人的不幸、國家的恥辱、東西文化認同的困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反而使他成為一種「離開傳統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時沒有找到彼岸依歸的『畸零人』」。 ²⁹ 猶如近代的「流亡知識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王韜也可以說是社會上的一個邊緣人(marginal man)。³⁰

悖離了中國傳統士人讀書報國、進而在仕途上有所發揮的理想途徑，身為游離於核心外緣的中間人與畸零人，即便王韜曾多次表明自己對旅行的喜好：

生平有酷癖，安得幾兩蠟屐，遍天下名山也哉。³¹《漫遊隨錄卷一·登山延眺》

余年未壯，即喜讀域外諸書，而興宗慙乘風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風俗奇異，輒為神往，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遊。³²《漫遊隨錄卷一·香海羈蹤》

²⁸ 柯文(Paul A.Cohen)對這群中間人有過精闢描述：「他們許多都曾深受儒學經典訓練，取得秀才資格，而又起碼部分是因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現所創造的新的就業機會而來到上海的。作為個人而言，他們頗不尋常，甚或有些古怪，有時才華橫溢。就整體而言，他們代表了中國大地上一種新的社會現象——條約口岸知識分子他們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他們在中華世界的邊緣活動。起初，他們的工作對中國主流中的種種事件似乎幾無影響，但最終他們所提出的東西卻與中國的實際需要逐漸吻合。直到這時，他們才漸次得到一定的社會和自尊。」美·柯文(Paul A.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6。

²⁹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6。

³⁰ 汪榮祖，〈王韜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收錄於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頁40。

³¹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3。

³²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32。

然而，當這趟出乎意料的「汗漫之遊」終能付諸實現時，在書寫及回憶的過程，卻可以從作品中屢屢讀到他的沈重鄉愁與深沈遺憾：

嗚呼！余少時亦嘗有志於用世，嗟勝年之不再，憫時事之日非，常欲投筆請纓，荷戈殺賊，以上報國家。用我無人，卒以讒去，蹈海旅粵，惟事讀書，終日弦歌，聲出金石，亦無有心人過而問焉者。今日羈身餘數萬里之外，去家益遠，而心彌悲已。³³《漫遊隨錄圖記卷二·倫敦小憩》

可見在王韜的傳統認知裡，無法實踐「荷戈殺賊，以上報國家」的責任與使命，仍是人生一大憾事。

類似的思鄉情緒，在王韜所感而作的詩句中更是明顯可見。例如他在收到倫敦畫館所繪的影像後，即作兩絕句：

九萬滄溟擲此身，誰憐海外一逋臣。形容不覺隨年改，面目翻嫌非我真。尚戴頭顱思報國，猶餘肝膽肯輸人。昂藏七尺終何用，空對斜曛獨愴神。

安得空山證宿因，避人無地且依人。有生已受形骸累，到死難忘骨肉親。

異國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風塵。可憐獨立蒼茫裡，撫卷聊看現在身。³⁴《漫遊隨錄圖記卷二·倫敦小憩》

抑或在遊覽蘇格蘭杜拉的名園盛景後所觸發之感：

嗟予窮厄世所棄，胸貯萬斛憂愁煎。山靈出奇為娛悅，令以文字相雕鐫。我鄉豈無好山水，乃來遠域窮搜研。昨日家書至海舶，艙波隔絕殊可憐。因涉名區念故國，何時歸隱江南邊。³⁵《漫遊隨錄圖記卷二·暢遊靈園》

³³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81。

³⁴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81。

³⁵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10。

這些思鄉感念、抒發個人情懷的文字，皆可令人感受到，王韜雖多次表明自己對於這趟泰西之旅的驕傲與自豪。³⁶但無法扼抑的鄉愁與知識分子的使命感還是時時提醒著他。

也正因為如此，當王韜在描寫自己所接觸的西方科技時，常常是抱持著與中國相互參看的對照態度。例如當他描寫自己在愛丁堡見識到英國印書技術之進步與發達時，立即興起見賢思齊之感：

其中男女作工者約一千五百餘人，各有所司，勤於厥職，澆字鑄版，印刷裝訂，無不純以機器行事。其澆字蓋用化學新法，事半功倍，一日中可成數千百字，聯邦教士江君曾行之於上海。其鑄版則先搗細土作模，而以排就字板印其上，後澆以鉛，筆畫清晰，即印萬本一不稍訛，此誠足以補活字板之所不逮。苟中國能仿而為之，則書籍之富可甲天下，而鑄刻手民，咸束手而無所得食矣。³⁷《漫遊隨錄圖記卷二·蘇京瑣記》

或記敘與西方人士的對談過程，也在不經意中顯示對國家時事的關心與期許。例如他在海耳與英國商人們的聊天內容：

詢余中國商務中以何項為巨擘，余答以絲、茶而外鴉片為大宗，然絲、茶有益於外邦，而鴉片實為中國之漏卮，當設何法以除之？皆無以應。中有勞愛先生者，獨侃侃而談曰：「嗣後當糾二三同志設一公會，必先禁印度栽種鴉粟而後可。」余撫掌稱善。³⁸《漫遊隨錄圖記卷三·重至英倫》

或在愛丁堡遊博物院時，見一几以礦煤琢成，因而好奇與司院者的問答過程：

司院者皆一一指示，且曰：「聞今中國山東境內，其山礦產金甚多，苟掘取之，國家可以致奇富，足用增課，於兵食國餉兩有所濟，惜官民皆疑以為多事也。」³⁹《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博物院》

³⁶除了自序中提到自己是「先路之導」的角色外，在登覽杜拉盛景、書寫完有關鄉愁的詩句之後，王韜還是不忘在文末強調：「噫，余處境雖厄，而遊覽之奇、山水之勝、詩文之娛、朋友之緣，亦足以豪，幾忘其身之在海外也。」

³⁷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20。

³⁸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52。

³⁹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19。

前者藉由對禁嬰粟之舉的稱許，表達了對中國鴉片之毒的痛恨以及國家弊病的針砭；後者藉由博物館司院者對中國煤礦無法加以開墾的惋惜，暗示了國家資源的浪費。

由上述所舉之例可以發現，王韜對他者的觀看之道，其實背負了許多沈重的責任。即便逃亡在外，還是無法與自己的原鄉徹底切割，以致於在接受新事物的衝擊時，本能的第一個反應，還是與自己的故鄉作一比較對照，進而在觀看的角度中，強化了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流亡的鄉愁，在新鮮獵奇的異國事物中未曾淡化，整趟旅程之中，不論從外在器物或內在制度的參與體認，自始至終，中國傳統士人教育所賦予的責任感並未卸下，王韜念茲在茲的，還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責任，在觀看西方文明的進步之際，同時也反照了自己對於中國文明的省思與刺激。

這種情境或許可與本文在一開始便提及的對位覺知來解釋。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⁴⁰因為流亡者同時可以拋在背後的事物以及此時此地的實況這兩種方式來看事情，所以有著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從不以孤立的方式來看事情。新國度的一情一景必然引他聯想到舊國度的一情一景。就知識上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觀念或經驗總是對照著另一種觀念或經驗，因而使得二者有時以新穎、不可預測的方式出現。⁴¹

這種愛國愛鄉之情，在他經過新加坡的停留中，有著更明顯的闡述：

新嘉坡古名息力，華人之貿易往來者不下十餘萬，多有自明代來此購田園、長子孫者，雖居處已二百餘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歲時祭祀仍用漢臘，亦足見我中朝帝德之長涵、皇威之遠播矣。聞前時斌京卿椿持節過此，曾有頂帽補服前來謁見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樂，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臨其地，宣揚恩惠，憑藉聲靈，俾其心悅誠服，歸而向我，樂為我用，豈非於海外樹一屏藩哉。⁴²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王韜即注意到海外華僑問題，且認為新加坡即使為大清王朝的棄民，卻仍有愛國愛鄉之情，建議設立外交代表予以聯絡保護。在泰西之

⁴⁰美·艾得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作、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頁86-87。

⁴¹同上註，頁86-87、97-98。

⁴²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43。

旅的前段時期，王韜對於外族的觀看之道，似乎仍跳脫不出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制。⁴³

流亡歐洲的同時，王韜在感知體驗新事物的歷程，比起一般旅人而言，有著不同的複雜層次。在自我與他者的接觸中，除了訝異於西方科技文明的進步之外，在新舊國度與自我身份的轉換思考之中，除了一貫的家國之悲與見賢思齊之感外，面對可能永遠無法回去更無法截然切割的故國，王韜在調整自我認知的過程也就更為曲折難解，這也使得他在重述當年面臨西方新事物時的觀看之道時，有著比一般旅人更為游移曖昧的多重視角。

然而，就觀看的行為而言，觀看是一種先於語言的存在，也正因為觀看方才確立了我們在周圍世界的位置，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深受知識與信仰的影響。觀看後不久，我們也可意識到別人也能觀看我們。他人的視線與我們的結合，使我們能確信自己置身於這可觀看的世界之中。⁴⁴

在《漫遊隨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王韜以旅人之眼觀看西方新事物，也以自我的審美觀與價值評斷，為陌生的他者作註解。例如他搭船前往英國途中，在開羅見到蒙面婦女時，便作如是描述：

肌膚已漸作黃色，面目亦無異人處，惟多以白布遮面，僅露雙眼，睜睜向人，狀殊可怖。⁴⁵《漫遊隨錄圖記卷一·改羅小駐》

對於陌生的蒙面婦女，王韜以「狀殊可怖」四字形容，說明了他對於不熟悉事物的刻板評斷。同樣的，在異域觀看他者的王韜，同時也成為他者所觀看的對象，例如他行經法國時，十六七歲的法國少女，「貌比花媽，眼同波媚，見余自

⁴³ 同樣的感觸，在《漫遊隨錄》中也曾再次出現：「按東南洋諸小國，列於職方，歲時朝貢，以備共球。自明中葉至今，盡為歐洲列國所分踞，視為東來之要道，蠶食鯨吞，幾無寸土，而海外之屏藩撤矣。予偶與備德言之，亦為歎噓不置，為言此間如新嘉坡等處亦有藩王，即古之君於其國者，為英官所節制，僅擁虛位、食廩祿而已。嗚呼！盛衰無常，可勝嘆哉。」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49。美國漢學大師費正清曾經針對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對世界的總體認識作了一番分析：「在對外關係方面，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與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他和周圍非中國人關係設定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中國這個國家已經逐漸形成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形象，即雄踞於中國舞台之巔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早期的歷史學家就提出了同心圓式的等級理論，據認為，地理距離越大的外圍蠻夷與皇帝的關係也就越淡，但不管怎樣，他們仍得臣屬於皇帝。和中國皇帝只能保持藩屬關係這種觀念雖然不時受到重創，但一直延續了下來。」參見費正清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33-34。王韜在《漫遊隨錄》中雖不再以此種態度看待西方文明，然而，對於東南亞諸國的觀看之道，卻仍未跳脫傳統的夷夏之分。

⁴⁴ （英）約翰·伯格（John Berger）著、戴行鉞譯，《觀看之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2。

⁴⁵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55。

中華至，咸來問訊，因余衣服麗都，嘖嘖稱羨，幾欲解而觀之。」⁴⁶、在英國鄉間時，更造成「男婦聚觀者塞途，隨其後者輒數千百人，嘖嘖嘆異，巡丁恐其驚遠客也，輒隨地彈壓。」之盛況。⁴⁷

當時中西交通尚不發達，黃皮膚、黑頭髮的王韜出現於歐洲境內，自然也為這些歐洲居民帶來不小衝擊。因此，在王韜體驗西方各式新事物、觀看他者、評論他者的同時，其實自己也成了被眾多他者們觀看的對象，法國少女欲解其衣而觀之的舉動、英國民眾沿途圍觀的好奇，正說明了這種特殊的交流方式。

而這種「觀看／被觀看」的權力移轉，可以從傅柯（Michel Foucault）對邊沁的全景敞視監獄（the Panopticon）所做的分析來加以說明。

根據傅柯的說法，全景敞視建築即透過觀視的運用，成爲一種權力運作的機制。「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一體的機器：在環形邊緣（囚室），人會被徹底觀看，但不能觀看；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到」。由於被囚者處於有意識的、持續的可見狀態，因此權力便能自動地發揮作用。由此可知，囚者（被觀看者）是權力加諸的對象，而監視者（觀看者）位處權力的出發點，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就很清楚了。旅行者本來是來「觀」光，卻成爲「被觀」的對象，這就暗示著權力關係的倒轉。⁴⁸

旅人不再是純粹的觀看者，在觀看他者的同時，也成了被觀看的對象。王韜在旅行過程中，體驗到了這種權力關係的倒轉。《漫遊隨錄》一書中所呈現最爲奇特且意義深刻的被觀看經驗，則是透過英國小孩的童稚眼光加以詮釋：

西國儒者率短襦窄袖，余獨以博帶寬袍行於市，北境童稚未睹華人者輒指目之曰：「此載尼禮地也。」或曰：「否，詹五威孚耳。」英方言呼中國曰載尼；其曰禮地者，華言婦人也；其曰威孚者，華言妻也。時詹五未去，故有是說。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識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鬚眉，蒙以巾幗，誰實辨之？迷離撲朔，擲身滄波，托足異國，不為雄飛，甘為雌伏，聽此童言，詎非終身之讖語哉。⁴⁹《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亨得利》

載尼即 Chinese、禮地即 Lady、威孚爲 Wife 之意。英國孩童誤以爲穿著寬袍的王韜爲女子，因而稱呼他爲 Chinese Lady，或誤認他爲華人詹五⁵⁰之妻。這

⁴⁶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58。

⁴⁷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23。

⁴⁸賴維菁，〈帝國與遊記－以三部維多利亞時期作品為例〉，《中外文學》，26卷、4期（1997年9月），頁78。

⁴⁹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31。

⁵⁰詹五爲安徽長人，身高六尺餘，原旅居上海，職業爲墨工，後因突出的身高被西人視爲「奇貨」，帶著他與歐洲身高未滿三尺的侏儒遊歷西方各國，滿載而歸。參見清·葛元煦：《滬遊雜記》，

種性別錯置的觀看方式，也使得王韜不得不發出深沈感慨，即便在《漫遊隨錄》中王韜已不再以一般中國傳統男尊女卑的絕對標準來看待西方女性。⁵¹然而，當一旦自己被誤認為是東方女性時，卻依然覺得深受衝擊，再回顧自己生平所為，未盡到報效國家之責，更有愧於原本上天賦予的堂堂男兒之身。

透過他者的眼中，王韜在被觀看的過程中，反而得以更清楚反思自我，進而以不同的角度審視我、瞭解自我。他者所呈現的觀看形象可能是經過扭曲、誤解的，然而，對被觀看的旅人而言，在反覆印證的過程之中，卻可以透過觀看位置與權力的互換，重新認識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自我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當英國孩童以扭曲的性別錯置解讀陌生的他者形象時，王韜在遊覽博物院的過程中，也意外驚見了西方人眼中另一種不同的中國人形象：

甫入門，即見有華人男女各一侍立門側，若司閽然，男則衣冠翎頂，女則盛服朝裙。余驚詢何人，以林文忠公對。蓋焚煙啟釁雖屬始於林，而因此得通商五口，皆其功也，故立像以紀其始。⁵²《漫遊隨錄圖記卷二·遊覽瑣陳》

禁鴉片而引發戰爭的林則徐，卻因同時開啓了通商五口的貿易功勞，因而在英國蠟像館中也被製像存念。「衣冠翎頂、盛服朝裙」的標準裝扮，說明了英人眼中的中國官員形象。對蠟像館而言，此二尊人像或許僅是新奇收藏品的一部份；但對王韜而言，在陌生異域驚見熟悉的臉孔面容，卻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刺激。

當王韜被英國孩童以女子形象觀看時，蠟像館裡頭的林則徐，卻是因為不同的理由被存像留念。從《漫遊隨錄》中，我們無從得知在當時英人是以何種眼光來看待這尊華人蠟像，然而，身為同一個遙遠國家的象徵符碼，在陌生異地所呈現的華人形象對比，卻是有著無比寬闊的解讀空間。

在旅行中同時扮演著「觀看者／被觀看者」角色的王韜，以沈重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書寫了游移視角下所呈現的異國風情與旅人心聲；在被觀看的權力倒轉遊戲中，王韜也得以透過他者眼中所呈現的東方形象，重新省視自我。即便身為

收錄於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年（1877年）至丁酉年（1897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頁84。王韜赴蘇格蘭時（1876年），詹五與其妻已先抵達英國，且聲名大噪。

⁵¹王韜在《漫遊隨錄》中，對於西方男女平等的情形多有描述，且對於旅途中所接觸的西方女子亦多加讚賞：「名媛幼婦即於初見之頃，亦不相避，食則并席，出則同車，觥籌相酬，履舄交錯，不以為嫌也。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潔其心，秉德懷貞，知書守禮，其謹嚴自好，固又毫不可犯干也。」王韜在英國停留期間所接觸的西方女子，幾乎都是以聰慧典雅的美好形象出現：「壁滿有妹約媚梨，在法京為女塾師，教女弟子以英國語言文字。一夕以盛設茶會，特延余至塾中。女弟子長者凡二十餘人，年皆十六七，無不明慧秀整，秋菊春蘭，各極極妙」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19、74

⁵²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99。

一個游離於邊緣地區的中間人與畸零人，在放逐的流亡生活中，王韜卻始終未曾脫離傳統的核心價值與士人責任，《漫遊隨錄》中的異地風情與文明形象，也在未曾偏離的視角游移中以某種固定方式呈現。

肆、結語－持續前進的書寫旅行

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類一日不滅，則其道一日不變。泰西人士論道，必溯原於天，然傳之者必歸本於人，非先盡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則仍繫乎人而已。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由今日而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日而視，其合則異而同。前聖不云乎東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請一言以決之，曰其道大同。⁵³《漫遊隨錄圖記卷二·倫敦小憩》

結束於牛津大學的演講後，王韜面對學生詢問孔子之道與泰西天道的不同處時，已經逐漸走出原本狹隘的夷夏論與天朝觀，以更寬廣的態度來看待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位置，從器物層面延伸到思想層面，坦然接受中西思想的不同表現形式。此處所言的「大同」，也早已不同於儒家傳統觀念所言「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作為新型知識分子，生活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交融的時代，出入、徘徊於中西兩種文化之間，其知識結構上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記，也深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濡染，王韜的文化認同也帶有「強烈的游移性、曖昧性與矛盾性」。⁵⁴正因為如此，在考慮王韜的世界觀時，尤應注意不要將其過於系統化，不要將其本來就含糊不清乃至前後矛盾的東西硬要劃一。⁵⁵

多數研究者將王韜的這趟歐陸之遊視為其思想轉折的重要指標，但柯文卻提出不同看法：

王韜的旅遊並未使他對西方的看法發生激烈變化，因為這種變化在他離港之前便已發生。⁵⁶

王韜對西方的看法，與他的世界觀發展一樣，都是在漸進中逐漸發生變化，無法為旅行作為分水嶺將其截然劃分。不過，實際感受西方生活的具體經驗，也

⁵³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80-81。

⁵⁴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52期（1999年4月），頁30。

⁵⁵ 美·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82。

⁵⁶ 同上註，頁48。

使得他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一片改革聲浪中，擁有更獨特的位置與更廣闊的批評視野。

遊歐後二十年，王韜於《點石齋畫報》上以連載方式發表當年這趟旅行的遊記作品—《漫遊隨錄》。結合圖像與讀者喜好而問世的出版背景，也說明了當年上海的閱讀生態，《漫遊隨錄》成了市場機制運作下作家與出版商共同合作而產生的文化商品。在鼓吹變法改革理念之餘，《漫遊隨錄》的書寫也成了王韜結合時事、推銷個人理念的一種策略，藉由重組記憶、再現西方的闡述過程，遊記亦成爲個人改革理念的推銷手法之一。

身爲流亡的知識分子，王韜對西方世界所抱持的觀看之道，也帶有著與故國無法割捨的雙重視角。在觀看他者的同時，中國士大夫的傳統認知依然存在，時時提醒他以一種沈重的責任感去看待異域、反思故國。然而，在觀看他者的同時，王韜也成爲被觀看的角色，透過他者眼中所呈現性別錯置的扭曲形象，王韜在角色互換的過程中，也重新認識一個陌生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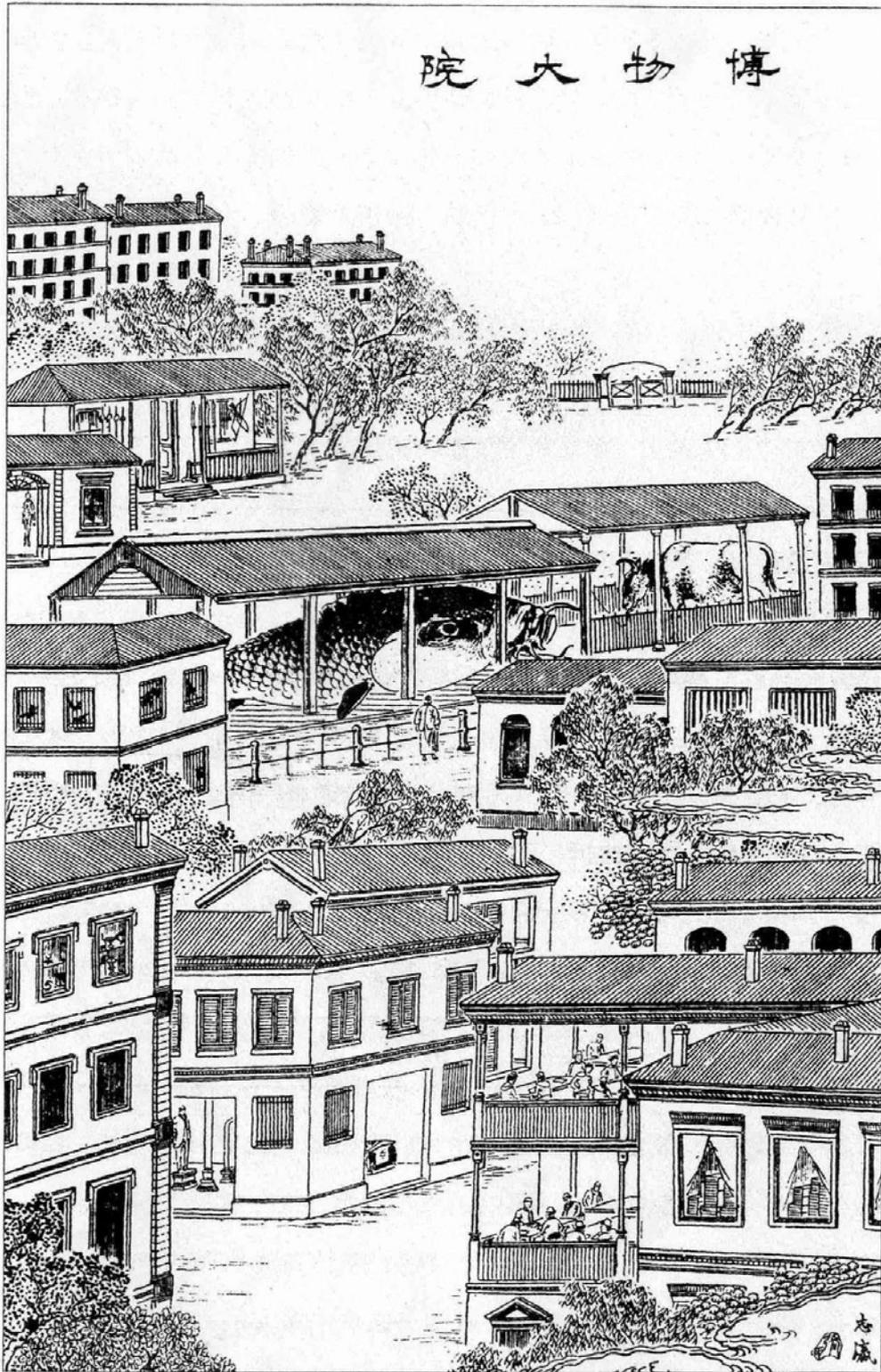
對於這趟跨越疆界的旅程，王韜自己仍是抱持著肯定且自豪的看法：

茲已歸自歐洲，縱橫三萬里，周歷四五國，泰西汗漫之遊，足以供其眺覽；極北蒼涼之境，足以蕩其胸襟。颿車電馭，逐日而馳；火艦風輪，衝波其上。所見奇技異巧，殆不可以僂指數。⁵⁷

在當被迫選擇離開故鄉的流亡生活中，卻意外經歷了難得的人生際遇，得以跨出國門、體驗西方文明，除了新鮮獵奇的文化刺激外，更擁有開拓眼界、蕩其胸襟的收穫。重新回到當時的出版環境與時代背景來審視這趟旅行的重新書寫，可以發現，透過回憶的重組與耙梳，當年的歐陸之旅仍以另一種形式在文字中持續進行延展，正因爲如此，《漫遊隨錄》所呈現的域外圖像與旅者省思，也具有比同時代類似作品更爲深刻的意義。

⁵⁷ 王韜，〈代上丁中丞書〉，《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卷8，頁5。

圖一



參考文獻

專書

- 美·艾得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作、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 美·柯文 (Paul A. Cohen) 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英·約翰·伯格 (John Berger) 著、戴行鉞譯，《觀看之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清·王韜，《漫遊隨錄》，收錄於(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年(1877 年)至丁酉年(1897 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 清·王韜著，陳尙凡、任光亮校點，《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清·王韜，《弢園尺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年。
- 清·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 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2002 年
- 清·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 清·葛元煦，《滬遊雜記》，收錄於(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年(1877 年)至丁酉年(1897 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 林啓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 年。
- 張海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 魯迅，《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
-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 年。

期刊論文

- 王一川，〈王韜—中國最早的現代性問題思想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99 年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58-66。
- 呂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談王韜與袁祖志的泰西遊記〉，《中外文學》34 卷 9 期，2006 年 2 月，頁 5-47。
-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 52 期，1999 年 4 月，頁 29-39。

賴維菁，〈帝國與遊記－以三部維多利亞時期作品為例〉，《中外文學》，26卷4期，1997年9月，頁70-82。

Oscillation and Ambiguity : The Strategy of Composition and the Way of Observing in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by Wang Tao

*Shi-Ru Chen**

Abstract

Wang Tao, who was the reformation forerunner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movement, took his first and unique travel to the Continent (1867-1870) after he was exiled to Hong Kong. The unique travel let him become the Late Qing forerunner of overseas travels. He was the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 who could not only study Europe through his real experiences of staying in Europe, but also bring the true image of China to the West.

In 1887, Wang Tao serialized his travelogue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in *The Dianshizhai Illustrated Journal* issued by Shanghai Shen Newspaper, twenty years after his travel. The publication form of this travelogue—memoirs of an individual—reflected not only the special culture of Shanghai but also the employment of some strategy to promote his concepts of reformation.

Living in a special age, Wang Tao experienced both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turns in life. He always observed things within a framework, vacillating between the

* Part-time Instruct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enter and the edge. During the process of observing and being observed, Wang Tao reexamined himself from others' misunderstanding of his sex.

Keywords : Wang Tao, travelogue, writing tactic, "Selections from Jottings of Carefree Travels," "the Way of Observing"